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九編第3冊

## 唐代明道文學與 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

符懋濂 著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3 冊

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

符 懋 濂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符懋濂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序 4+ 目 2+27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 3 冊)

ISBN：978-986-322-535-5 (精裝)

1. 中國古典文學 2. 文學評論 3. 唐代

820.8

103000744

ISBN-978-986-322-535-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322-535-5

## 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

作 者 符懋濂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九編 27 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

符懋濂 著

## 作者簡介

符懋濂，又名符名濂，祖籍海南省文昌縣，1938年生於馬來亞丁加奴州，11歲移居新加坡。1959年南洋華僑中學畢業，三年後就讀於南洋大學歷史系，榮獲馬來亞瓊州會館獎學金，畢業時獲頒南大金牌獎。1976年獲得南洋大學歷史碩士學位，2006年獲得上海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歷任立化中學、國家初級學院歷史專科教師，以及裕廊初級學院中文部主任、副院長，其間兼任南洋理工大學講師多年。退休後曾任新躍大學講師、國立教育學院導師十餘年。已完成的作品有《中學歷史新編》（合編初中課本）、《東亞史新編》（高中課本）、《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與立憲派的思想論戰》、《捻之本質及其戰法》、《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等。此外，還發表文章數百篇，已輯成論文集《思想碰撞的火花》、雜文集《孔夫子南遊夜郎國》、《阿Q永垂不朽》，擬將付梓問世。

## 提 要

透過歷代對文史本質、文史範疇與文史功能認知的比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觀的歷史定位：承前啓後，一脈相傳，其延續性與穩定性顯而易見。

文史基本功能幾乎完全重疊，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特質，從而構建了十分相似的文化基因圖譜。「文史合一」就是這兩個文化基因圖譜的產物。

唐代明道文學觀是正統的，而正統歷史觀則是明道的。無論是詩教說、是明道說，其核心價值為經世致用，即將文學作為「修齊治平」的文化軟件；而正統歷史觀內涵中的政治大一統、王朝正統性、疏通知遠、以史為鑒，則可歸納為「經世致用」四字，同樣是將歷史作為治國平天下的文化軟件。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世致用便成為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最主要的共同特徵，也是維繫兩者文化共性的堅韌紐帶。

文史合一的文化傳統在唐代得以延續與發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的明道文學觀和正統歷史觀含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由儒家思想所釋放的認知功能、教育功能與借鑒功能。文中有史，史以文傳，從而構建了中國古代文史的傳統特徵。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史學與新文學既然同步形成，人們不但對文史本質有了全新的界說，而且對文史範疇、功能的認知，也發生了質變。但因古今文史觀的歧異，而出現新舊文史脫軌的文化現象。

因此，作者主張：在分別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古今文史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的同時，也應逐步推行舊文學與新文學、舊史學與新史學之全面接軌，以促進中國新文學與新史學的發展。

# 序 文

楊 明

符懋濂先生的著作《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即將出版了。這部著作原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作為該論文的指導教師，我當然感到十分高興。

符先生是新加坡華裔學者。初次相見的時候，我已經過了耳順之年。當時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精幹而樸實。當得知他的年齡比我還大，已經退休多年，並且還在「發揮餘熱」，從事著社會教育工作的時候，不禁感到驚訝和佩服。接著又得知，他原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早已取得了碩士學位，只因後來新加坡教育制度發生變化，所以未能繼續攻讀博士課程。如今就是為了圓這個繼續學習博士課程的夢而來到復旦的。他的深造，完全是出於興趣，爲了求知，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我還是第一次指導這樣年齡和經歷的學生。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們經常交換意見。符先生原來的專業是歷史學，而我感到他對於中國古代文學也有相當的瞭解。文史不分家，本該如此。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據符先生說，他在新加坡讀中學時，對於許多中國古代詩文名篇都是按要求背誦、精讀的，因此獲益匪淺。隨著寫作的深入，我們二人在一些問題上當然會有不同的想法。我是直來直去，學術上有不同想法就要說，儘管符先生年長於我，經歷比我豐富；符先生呢，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有時候所謂「指導」便成了二人之間的學術研討。我覺得符先生的這種坦誠，這種堅持獨立思考、決不盲從的精神，非常可貴。教學相長，在相互討論的過程中，我也獲得了好處。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至今還記得當時討論甚至是爭論的情景，並且十分懷念。

在《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中，確實可以看到不少經過深思熟慮，有著親切體會的見解。例如，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中的正統歷史觀，其核心內容乃是大一統的理論。論文說：「從元代開始，凡是能夠統治全中國，實現政治大一統的王朝，不論來自哪個民族，都被視為正統王朝，如元王朝、清王朝。這就是王朝正統性的真正內涵，雖然王夫之、梁啟超等人並不接受此一界說。」王夫之、梁啟超在思想史、史學史上的學術地位當然崇高，但符先生並不盲從他們的觀點。論文又強調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理念的重要。秦漢統一以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雖然也有過不止一次的分裂時期，但「大一統」的理念始終存在，終究轉化為政治、民族的統一。與歐洲歷史比較起來，統一是一個鮮明的特點。論文說，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幾個大帝國，如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一旦分裂，就再也無法統一。中國則不然。其間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地理、歷史、經濟諸種背景上自然而然地產生的「大一統」理念的確立，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論文熱情地指出：「兩千餘年來，大一統觀念不僅早已演化為文化基因，滲入中華傳統文化實體之內，而且歷久彌新，魅力無窮，就連今日的海外華人也深受其惠。」作者舉例說，對於臺灣分離主義者「去中國化」的倒行逆施，華人中凡接受中文教育者多深惡痛絕，這就是因為他們「蒙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血液中含有政治大一統的遺傳因子」。符先生說，此點或許國內文史學者關注還不夠，故在論文中特為指出。

從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理念之重要，論文肯定了漢代獨尊儒術的積極方面：「從漢武帝開始，思想大一統與政治大一統結合為一，相互作用，構成正統歷史觀兩股精神或道德力量，支撐著歷代中華帝國的重建與發展。……從歷史主義角度來看，我們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既不可否定，也不可忽視。」

單就這點而言，董仲舒不愧為獨具慧眼的思想家，而漢武帝不失為非凡的帝王。而儒家思想既取得了權威的地位，又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它並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世俗性的思想。因此，「中華民族的宗教信仰趨向於多元性」，「從根本上排除了一元論信仰的極端化，消除了宗教戰爭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而且「歷代統治者還可充分利用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各地區、各族群之間的利害衝突，使之有利於政治大一統的重建與維繫」。

論文還強調了漢字與大一統的關係：「漢字是大一統理念的產物，而漢字的獨特性，使其政治功能超越拉丁或任何一種表音文字」，對於重建、維繫歷史上中華帝國的大一統功不可沒。

從上面簡略的介紹，不難看出，符先生的治學，確確實實是深思熟慮，決不隨聲附和。而且從中也讓我們感受到一位海外華裔對於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的拳拳之心。

今年春夏之交，我們國家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嚴峻的考驗。3月14日拉薩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事件，西方某些媒體乘機造謠誣衊，激起了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的極大義憤。中華民族子孫的血液畢竟有著共同的遺傳基因。符先生多次給我來信，義形於言，令人十分感動。嗣後又是5月1日的汶川大地震，全球為之震撼。符先生同樣極大地關注著，和我們一起悲痛欲絕，一起為災難中煥發的人性光輝而深深感動。他堅信古老而年輕的中國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幸有成城眾志，不懼萬險千難」，「十三億神州，多英傑」，「齊心繪就、江山似畫，誰能越」。他在所作詩詞中這樣堅定、熱情地歌唱。讀了符先生的信，我更加感到他的論文中許多觀點真是出自內心深切的體會。

借著論文出版之機，回顧數年前讀論文時的感受，回顧和符先生的交往，當日情景又回到眼前，頗感愉快，也不禁覺得有點兒留戀。拉拉雜雜寫下一些，權為序言。

楊 明

2008年7月於上海浦東

## 語錄二則

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

分析不怕細緻、深刻，否則不能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綜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則不能顯示歷史的全貌、線索。因此，在分析的時候要鑽進個別歷史事件裏去，用顯微鏡去發現問題；在綜合時，又要站在個別歷史事件之外，高瞻遠矚，用望遠鏡去觀察歷史形勢。

（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



# 目 次

序（楊明）	
語錄二則	
前 言	1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標	1
二、指導思想與研究方法	4
第一章 唐代的基本文史觀念	11
第一節 唐代的基本文學觀及其範疇、功能	11
第二節 唐代的基本歷史觀及其範疇、功能	21
第二章 承前啟後：唐代文史觀的歷史定位	31
第一節 唐代基本文學觀的延續性與穩定性	31
第二節 唐代基本歷史觀的延續性與穩定性	43
第三節 唐代文史觀延續性與穩定性形成的基本因素	53
第三章 古典現實主義是明道文學觀的核心	65
第一節 明道與詩教、言志、緣情的關係	65
第二節 明道文學觀的真正蘊涵	77

第三節 唐代文史家的人生境界與憂患意識	89
第四章 大一統思想是正統歷史觀的基石	103
第一節 正統歷史觀的真正蘊涵	103
第二節 唐代文史家的大一統理念	116
第三節 大一統思想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	128
第五章 從文學著作窺探唐代明道文學觀	141
第一節 明道文學觀是否對唐代詩歌產生負面 效應	141
第二節 唐代散文與明道文學觀	149
第六章 從歷史著作窺探唐代正統歷史觀	163
第一節 唐修正史與正統歷史觀	163
第二節 吳兢《貞觀政要》與正統歷史觀	178
第七章 唐代歷史家的文學觀	189
第一節 劉知幾的文學觀	189
第二節 魏徵等歷史家的文學觀	198
第三節 文學在唐修正史中的位置	208
第八章 唐代文學家的歷史觀	219
第一節 韓愈的歷史觀	219
第二節 柳宗元的歷史觀	230
第三節 歷史在唐代文學中的位置	241
餘 論	253
附 錄：《「二十六史」體例、規模一覽表》	263
參考書目	263
後 記	269

# 前 言

##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標

根據手頭資料，如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杜曉勤撰《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以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羅聯添《唐代文學論著集目》，我發現在古代文學領域裏的跨學科比較研究（尤其是文史比較研究），似乎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其研究成果並不那麼顯著，至少在唐代文學的領域是如此。當然，這只是一種相對性的看法或比較性的判斷：它首先指與單學科研究相比較，跨學科研究起步較晚，其成果顯得比較遜色；其次指唐代文史結合的研究成果偏重於文獻方面，尚有待向理論方面轉化、提升。若嚴格地說，在此所謂「跨學科研究」，乃是指自覺地將文學與另一學科（如歷史）之相關課題，置於同一學術平臺，進行對等性的、雙向性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它屬於源自現代西方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之範疇，即屬於比較文學之組成部分（另一部分為本學科之比較研究）。因此，一般上我們不將涉及歷史或其他學科的文學論著，統統歸入跨學科研究成果。例如，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裏，既論文又論史，但不屬於具有現代意義或特定意義的跨學科研究。而今人有關唐代文學之考證專著，一般上也不列入跨學科研究之範疇。

至於在歷史領域，根據張國剛主編《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周朝民等著《中國史學四十年》（1949～1989年）以及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歷史學年鑒》（2002年），我同樣發現跨學科研究似乎不很受重視。因為從以上五書所提及的研究課題，乃

至羅列的大量著作目錄與論文目錄中（包括臺灣地區、日本、歐美各國），我們很難找到有關跨學科的理論性論著。這就難怪不久之前，有位歷史學者感慨道：「依稀記得，1985年3月，白壽彝先生在史學史會議上，曾號召大家對經史、文史、子史關係作深入研究。可惜的是，這個意見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關注既少，成果自然不多。」〔註1〕另一位歷史學者也提出類似的看法：「這種跨學科研究在今天才剛剛起步，尚未拿出足可稱道的成果，或者說成果還很有限，但正如眾多提倡者所說的，這並不妨礙推廣它的必要性。」〔註2〕這兩位學者指的都是現當代歷史學裏的跨學科研究。後者謂「尚未拿出足可稱道的成果」似乎言過其實，前者謂「成果不多」則或許比較貼切。但無論如何，其言論之目的或動機在於強調「推廣它的必要性」，而非有意貶低他人的研究成果。

進一步說，若將跨學科研究的定義與範疇擴大，當然可以舉出不少「足可稱道的成果」，因為「文史合一」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許多學術論著都涉及文史兩學科。例如，現代學者陳寅恪繼承了用詩文考證歷史的文化傳統，自覺地進行「以詩證史、以史論詩」，取得非凡成就，《元白詩箋證稿》即其代表作。而另一著名學者傅璇琮亦以文史結合方法，研究唐代文學，成就斐然，其《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均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然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文史領域浩如煙海，任何個人的重大學術收穫，放諸汪洋大海之中，只不過滄海之一粟。以上之客觀現實，既萌發了我選擇跨學科研究的動機，也增強了我從事這項研究的勇氣與信心。

再者，無論如何，涉及唐代文學觀與歷史觀的著作或文章，雖為數不少，但幾乎都囿於單一學科範圍之內；將兩者置於同一學術平臺上，進行有系統的、跨學科比較性研究的論著，我個人還沒見過。更況且，以我看來，在涉及中國古代文學的著作中，一些學者對唐代明道文學觀（即文以明道）的見解與論斷，還存在若干非歷史主義的或值得商榷的觀點。例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韓柳倡導文以明道，「反映出文學觀念的退步」，「確實是遏制文學生命力的因素。它預示著一個文學——特別是傳統的文人文學衰退時代將會到來」。〔註3〕張岱年等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亦提出「文以載道」的負面影響：

〔註1〕許凌雲：《經史因緣》代序，齊魯書社。

〔註2〕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第247頁。

〔註3〕章培恒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中冊，復旦大學出版社，第15～16頁。

「它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淪為政治的附庸，從而削弱了其主體意識和個性自由。」〔註4〕在涉及中國古代史學的論著裏，類似的非歷史主義觀點亦屢見不鮮，主要認為正統歷史觀與明道文學觀並不可取，因為兩者都是維護封建王朝專制體制的——對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的清代既是如此，對處於封建社會盛期的唐代亦不例外。因此，單就此二者而言，將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置於同一學術平臺，用歷史主義觀點重新進行深層次、多角度的審視探討，看來是有意義、有價值、有必要的。

學術研究的預期目標，大體上只有兩類：一類是開創性的，即進入前人未曾觸及的學術領域，從事「補白工程」（或「創意工程」），開拓自己的新天地；另一類是強化性的，即總結吸納前人研究成果，注入自己一些研究心得，使某項學術研究取得一些進展，可稱為「強化工程」或「添磚加瓦工程」。當然，兩類預期目標各有其難度，主要取決於研究性質、對象，以及預期目標的大小和高低。

我選擇了第二類。論題《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既屬唐代文學思想範疇，亦屬中國文學與中國史學的「歷史範疇」。假如中國文學史與中國史學史是兩幢興建中的並列摩天大廈，我希望為它們各添加一小塊磚或幾粒小石；假如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史學史是兩幅尚未完成的萬米畫卷，我打算在毫不顯眼的空白角落各抹上一筆，縱然只是輕輕的、淡淡的一筆。

為了落實上述「添磚加瓦工程」的總目標，我初步預設以下四個「子目標」：

其一，首先借助文本，探討唐人的基本文史觀念，使之恢復歷史原貌，即讓唐人說出他們理念中的文學與歷史；然後再予以歷史定位，並分析其穩定性的歷史因素。

其二，針對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核心內容，作比較性的文化闡釋，從中瞭解兩者的內在聯繫、文化精神與歷史價值。

其三，通過各類型文體的文史作品審視唐人的文史觀念，從中窺探其文史觀對各類文史作品的實際作用，或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重大影響。

其四，用交叉對比法，審視唐代文學家的歷史觀和歷史家的文學觀，藉以探尋「文史合一」這個文化傳統的脈絡。

〔註4〕張岱年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75頁。

以上四個「子目標」，將以八章論文逐步完成。大體上說，每兩章針對一個「子目標」，大約需要五六萬字。我希望在四個「子目標」內，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提出（或強調）一些不很成熟、與眾不同的論點，如「理性精神（理性作品）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核心」、「大一統是正統歷史觀的基石」、「文史功能之時代性（古今不同）」、「文史合一的共同基因」等。不論這些需要經過論證的假設性論點是否獲得廣泛認同，只要言之有理或持之有故，足以自圓其說，就應該是有點學術意義的吧？或者用學術界「行話」來說，就是期望引起他人對相關課題的注意與研究，從而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或客觀效果。

然而，嚴格地說，「拋磚引玉」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學術目標，它並不宜作為博士論文的最高目標。我認為學術研究最忌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任何一篇博士論文都應具有獨創性，並以「成一家之言」為其最高目標。章學誠對如何「成一家之言」，曾提出十分精闢、獨到的見解，值得我們重視與借鑒：

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  
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  
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註5〕

章學誠所謂「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既是「成一家之言」的四個先決條件，單從理論上看，十分淺白易懂，但若耍付諸實踐，難度可不小！尤其是「異人之所同」，不僅要付出雙倍的腦力勞動，而且要具備較高的理論水平與學術能力。儘管如此，「異人之所同」既是我所選擇的努力方向，也是我所要實現的總體目標！

## 二、指導思想與研究方法

俗語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術研究是極其複雜而又細緻的思維活動，它既需要理論指南，也需要研究方法。理論與方法，都屬於研究者必須掌握的「利器」。我個人認為，對歷史（包括文學史）研究而言，最佳的理論指南是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和歷史主義。前兩者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後者則源自歷史唯物論。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則應兼收並蓄，因為「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李

〔註5〕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斯《諫逐客書》) 凡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實證主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及新興的「計量歷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 所用的統計法和圖表法，都可以斟酌採納。不過，我始終認為研究方法應該只求好、不求新。

只求好、不求新的理由何在？因為學術研究並非時裝設計，不必要追時尚、求時髦；新理論未必較舊理論更好，況且某些所謂「新理論」，只不過新瓶裝老酒，再加上精緻紙盒新包裝而已，根本沒有多大應用價值可言——至少對本書課題的研究是如此。根據辯證唯物論，我們知道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源自物質，但對物質亦有反作用，甚至具有改變物質的力量。其次，一切物質與精神都是變動不居的，靜止只是相對的暫時現象；變動也是多樣性的，是由前進與後退交織而成的發展過程。同時，事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有了這樣的基本認知，並在其指導下，才能對文史觀念進行比較透徹的學術剖析，才能提出比較科學的文化闡釋。

唯物辯證法則屬於方法論的範疇，它對我們的思維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它的核心思想是由三大定律(Laws) 與多個範疇(Categories) 構成。三大定律即質量互變律、矛盾統一律、否定之否定律，而多個範疇包括本質與現象、根據與條件(或內因與外因)、內容與形式、原因與結果、特殊與一般、偶然與必然等。這些定律與範疇所涉及的原理、原則，不但可用來提升我們的理論水平，強化我們的分析能力、判斷能力、綜合能力，而且可用來拓展我們的思想領域，建立我們的辯證思維架構或思維邏輯。我們的思維方式必須是辯證的，而不能是機械的。同時必須指出，辯證思維是開放性的、兼容性的思維模式，而不是狹隘的教條主義；辯證思維既是西方的、現代的，也是中國的、古老的，因為它早已存在於《周易》、老莊哲學乃至中醫理論之中。

由於唐代文史觀念的比較研究，畢竟是個歷史課題，歷史主義的指導作用自然更加必要、更加直接。不過，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歷史主義仍缺乏共識。20世紀60年代初，著名史家翦伯贊提倡歷史主義，曾引發一場大論爭，連一些文學家也參與其盛，如唐弢在1960年9月18日《光明日報》發表《略談歷史主義》。他說：

所謂歷史主義，它不但包括昨天，而且包括了今天和明天。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是一個現代的活著的人，承認歷史還要一直伸展到明天，我們就必須有發展觀點，用發展觀點有分寸地、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一切優秀的古典作品，既有繼承，也有所批判。

我認爲唐弢對歷史主義的看法很具代表性，至少代表當時部分學者的看法。然而，這個看法並不很正確，也不甚高明，因爲歷史主義者可以也應該關注「今天」和「明天」，但歷史所講的應該只是「昨天」，至於「今天」和「明天」都不應包括在內。翦伯贊卻全然不同，他已注意到這一點。針對如何評價歷史人物，他提出以下論述：

從歷史唯物論主義的觀點出發，評論一個歷史人物，當然不是要求我們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一個歷史人物；而是要嚴格地聯繫到這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和歷史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因爲一定的歷史時代只能產生一定的歷史人物，這是歷史的局限性。如果把這個歷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顧或估計得不夠，都是不正確的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註6〕

相比之下，翦伯贊的見解顯然十分正確、十分可取，但僅僅涉及歷史人物的評價，未能涵蓋歷史主義的全部內容。依我的淺見，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cism)就是堅持用歷史視角或觀點去看歷史，包括評價歷史人物，研究歷史問題，剖析各種歷史現象，並以「恢復歷史原貌」爲最終目標(這點最重要)。在審視歷史過程中，必須充分注重歷史的時代局限性，即必須充分瞭解社會發展階段(即經濟政治形態)的時代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形態與意識形態的時代性。當然，時空觀念、審美觀念與道德觀念的時代性同樣明顯，也同樣值得我們關注、重視與把握。如果我們將唐人文史觀念「現代化」，然後依照我們的價值觀念、現代標準或取向，採用所謂「現代視角」去評價其優劣得失，就是非歷史主義的，就會不可避免地走進時空觀念錯位的誤區。

辯證思維與歷史主義僅僅是指導思想。單憑指導思想進行學術研究，無論如何是不足夠的。要解決學術研究所出現的錯綜複雜問題，還得將指導思想轉化爲具體的研究方法，然後運用到研究過程中去。

其一，必須大量查閱文本，並以文本爲立論的最終依據。所謂文本，在此是指原始資料(Original Sources)或第一手資料，即與唐代文史觀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古代文獻。若非不得已，應該避免使用第二手資料(Secondary Sources)。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固然必須十分珍惜、尊重，而且可以酌量採用，但必須經過嚴格的鑒定、篩選。至於權威學者、著名專家的見解，以及一些普遍公認的所謂「定論」，如果和文本相抵觸，或者缺乏足夠原始資料爲

〔註6〕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93頁。